

日本研究的方法论

——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

〔日〕安藤彦太郎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日本研究的方法论

——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

〔日〕安藤彦太郎 著

卞 立 强 译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日本研究的方法论
——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

〔日〕安藤彦太郎 著

卞 立 强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 $\frac{1}{2}$ 印张 76,000字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1册

书号：3091·465 定价：0.41元

出版说明

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常务理事、早稻田大学教授安藤彦太郎先生是日本知名的中国学学者。1980年7月，他应北京大学邀请，为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及北京有关单位的日本研究工作者作了有关日本问题研究的学术报告。以后又在东北的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等地，向有关日本研究工作者作了同样题目的学术报告，并进行了座谈。本文是他所作学术报告的讲稿。讲稿经他本人审阅、修改过。

本文对日本战前、战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整个社会以及日本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都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介绍深入浅出，贯穿着安藤先生独特的观点和看法，对我们很有启发。安藤先生还在本文中对我国研究日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今后改进的意见，也值得我们深思。故译出发表，供全国研究日本问题的同志参考。承蒙安藤先生慨允发表本文，在此表示感谢。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十月

目 录

一、日本的中国研究的特点	
1. 古典研究与现实研究的分离	1
2. 战后现代中国研究的发展	16
二、从日本看中国的日本研究	
1. 认识日本与研究日本的矛盾	35
2. 留学生教育问题	53
三、战前战后的教育制度与日本人的思想	
1. 战前的教育制度	74
2. 战后的新教育制度与大众社会状况	88
四、战后资本主义及社会生活的变化	
1. 战后资本主义的特点	110
2. 社会生活的变化	128

一、日本的中国研究的特点

1. 古典研究与现实研究的分离

(1) 历史的原因

我是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不是日本问题的研究者。就日本研究来说，专业确是不同。但我在这里还是提出了“日本研究的方法论”这一题目。其理由有以下两点：

第一，我作为日本的一个中国研究者，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的日本研究，感到存在着种种的问题。中国研究和日本研究都是把特定的地区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观察的地区研究。在这一点上两者有着共同性。从这种地区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不能不感到中国的日本研究在方法论方面有进一步加深的必要。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也

许对中国也是有用的。

第二，最近日中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但就我所见，感到有些场合中国似乎并未准确地打中日本的靶子。不能准确地打中靶子，就会产生浪费。就这个问题来说，如果就中国方面的错误或日本方面的对待方式不恰当，一一地举出具体的例子，那是举不胜举的。我认为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我的讲话就是基于以上的理由。但有两点事先要求得到大家谅解，第一，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想会有很多的错误；第二，有时也许会说一些使大家感到逆耳的话。

今天首先想谈一谈日本的中国研究的特点。

日本人的中国研究，一向是分为研究古典的中国和研究现实的中国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进行的。这起因于日本人传统拥有的中国观。关于这一点，我在一九七〇年出过一本书叫《日本人的中国观》，我在那本书里谈过。我想根据这本书的精神，简单地谈一谈。

日本人非常尊敬古典的中国——即古代的中国，但对现实的中国则加以轻视或蔑视。他们拥有这样两种分裂的中国观。比如说，日本人的家里有一处叫作“壁龛”的装饰着挂轴的地方，那里挂着写有汉诗的挂轴。如果这诗是中国人写的，那就显得更加珍贵。

在挂轴的前面，往往还摆着唐三彩之类的复制品。另外，日本人没有人不知道《论语》、《孟子》之类的书名，大家都能按日本式的读法，记住其中一两句话；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水浒传》、《红楼梦》之类的书名。

但是，日本人未必因此而尊敬中国，对中国怀着友好的感情。那些爱好中国的书法、爱读《论语》的人却轻视现在的中国。这样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

大家都知道，对古典的中国感到尊敬，那是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属于中国文化圈，处于中国文化的绝对影响之下。日文最初是直接用汉字书写，平假名和片假名也是根据汉字创造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直接吸收了中国的隋唐文化，全部模仿了中国的法律制度。大家到日本去旅行时立即可以了解，奈良和京都至今还遗留着模仿中国古代城市的痕迹。后来日本慢慢地摆脱了中国的影响，到镰仓时代则发展了日本独特的封建制度。但是，在学术和思想方面，中国的影响反而增强了；到了德川时代，这种影响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德川时代即江戸时代，日本采取锁国政策，只同中国及荷兰以长崎为窗口进行贸易。据吉川幸次郎先生指出，据说有的贸易船全部都装着中国的书籍。日本之所以如此大力引进中国文化，是由于考虑到宋学（特别是朱子学）有利于给德川封建制作理论上的解释。朱子学成了德川时代唯

的官学。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渐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所谓“脱亚入欧”是福泽谕吉的话。福泽说过“天不造人上之人”，他是在日本最早倡导民主思想的人，是庆应义塾大学的创建者。大隈重信创立早稻田大学，福泽谕吉的影响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关于福泽，以后还要谈到。这种“脱亚入欧”的政策，也对民众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一般日本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慢慢地产生了轻蔑的思想。中国的留学生到了日本，往往会意识到这一点；在官厅或学校的窗口接触工作人员，有时会发现他们对西洋人十分亲切，而对亚洲人却不那么亲切。

由此可知，对古典的中国的尊敬和对现实的中国轻蔑，是明治以来日本人当中培植起来的中国观的特点。最近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杰出的国家，这一特点已经大大地淡薄了。但是，稍为剥开一下日中友好的外衣，还可发现这样的中国观仍然浓厚地存在着。而且这样分裂为二的中国观也反映在中国研究里。

刚才所举的朱子学，是一种主张把“人伦五常”之道和“宇宙的理法”当作共同原理的学说，所以德川时代的朱子学研究并不是中国思想的研究，而是世界观的研究，并认为朱子学研究本身就是学术。与这

种情况相反，从朱子学研究当中出现了主张应把中国当作客观研究对象的学者。其中主要人物之一就是荻生徂徕。丸山真男先生指出荻生徂徕的思想中有着日本近代思想的萌芽。丸山先生是在其《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中作出这样分析的。这本书是战后不久出版的。自出版以来，对日本的政治学乃至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丸山先生本人对中国也怀有深刻的关心。但我感到遗憾的是中国的学术界并没有注意到丸山先生。这些暂且不说。由于在德川时代后半期，当时的市民社会尚未成熟，荻生徂徕的思想并未为后世所充分接受就告终了。因此，我感到可以这么说，在江户时代之前并不存在一般所谓的中国研究。

到了明治时代，传进了西洋的学术——即所谓的洋学，代替了朱子学。朱子学被称为汉学，重新改组为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理论而残存下来。所以日本人当中至今还有一种倾向，觉得用汉字写的东西都带有一点陈旧的、封建的味道。这种汉学的中枢就是过去的东京帝国大学的汉学科。

这种汉学必然从与洋学对比的角度，向中国研究的方向发展，在中日甲午战争时首先从汉学中分化出来了历史学。日本所谓的东洋史学，实际上是指中国史。历史学本来是由德国导入日本的，后来受到法国的影响，分化出了东洋史。总之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

过程，所以东洋史学的必修外语向来是法语，至于汉语则可以不用，只要能阅读汉文即可，而这种汉文又是按训读法，即日本式的解释来阅读的。这种风气一直延续了很长的时期。

以后又分化出来了文学。这种所谓的文学，当然是古典文学，而不是当代文学。最后留下来的是作为封建教育思想的哲学。日本现在的中国哲学已不尽是封建哲学，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大多是具有封建思想的人。

如上所说，提起学术界的中国研究，不论是历史学、文学或哲学都是古典研究，根本不搞现代的研究。因此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果，在大学里从事这些方面研究的学者很少会汉语，大学的中国文学科的教授有的竟不会汉语。英文科的教授没有人不会英语的，相比之下，确实是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

现实的中国在学术界没有成为研究的对象，其原因是出于两种想法，一是认为中国没有可学的东西；二是认为不值得研究。对中国感兴趣是出于商业上的需要或军事侵略的需要。为此而进行调查的是日本的陆军或与军方有密切关系的机关以及企业等。说它是研究，不如说是调查。这种调查称为兵要地志调查。

最初有计划地进行兵要地志调查的机构是一八八七年在上海成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它是以日本陆军

为后台而创立的一种学校，后来发展成为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战后撤回日本，现在称作爱知大学。

日俄战争的结果，日本势力进入中国的东北，创办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其中建立了大规模的调查部。于是这个部遂成为中国调查的中心机关。最初只是进行兵要地志的调查，进入三十年代以后，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了进来，理论水平不断提高，产生了很多中国研究的成果。在日本国内受到镇压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要进入满铁调查部就允许进行研究。研究的水平愈高，当然对侵略中国愈有效。这确实是一个讽刺。

另外就文学来说，在一九三四年竹内好等人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之前，几乎没有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大学里也不讲授。

日本任何一所中等以上的学校都开设有所谓汉文的课程。前面已经说过，其方法是按日本的方式来训读中国的古典，与中国人阅读古典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所谓汉文课，简单地说，是一种近似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的辅助课程，不能说是外国文学。与此相反，日本从来未曾设置过汉语课程，尤其是在官立的旧制高等学校和大学即所谓优秀分子所上的学校，除了大学的文学部外，战前均未开设过汉语。日本所谓外语，主要是指英语、德语和法语。第一流的大学教授

汉语是战后才开始的。这种传统一直遗留到今天，大学里选修汉语的学生为数极少。

刚才已经说过，日本的学术在明治维新以后是作为洋学开始的。因此，比如说法律学的教科书里，即使谈论到了欧洲的某个小国的法律，一般也不会写到中国的宪法。经济学、社会学在这一点上也都是同样。所谓中国，那是特殊研究的对象，大学里只是专门进行古典的研究，至于现实的中国，则由满铁调查部去调查研究，或由新闻工作者去进行评证。战前就是这样的状况。一九三九年尾崎秀实在《现代支那论》的序文中说：“在古典的支那社会与现代支那社会之间搭桥的巨大努力，可以说过去是完全被忽视了。”这里我想对尾崎秀实作一点说明。他当时任《朝日新闻》的记者，对中国问题造诣很深，担任近卫文麿首相的顾问。他的《现代支那论》的写法，表面上好似讴歌当时的时局，其实仔细阅读，他是非常正确地观察了中国。当时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发生了所谓社会史论战的论争，分为“中国农村派”和“中国经济派”。而《现代支那论》就是站在“中国农村派”的立场上所写的一部书。尾崎秀实就是这样地一方面表面上赞助当时的日本政策，另一方面却悄悄地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被发觉后，他于战争末期被捕，判处了死刑。

正好与中国的社会史论战同一时期，即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展开了所谓资本主义论争。一派强调日本社会的半封建性，因而规定日本的革命为二段革命，并认为明治维新是绝对主义改革。这一派称作“讲座派”。另一派强调日本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预想即将到来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并认为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派称作“劳农派”。从论争的立论方式来看，讲座派类似于中国的“中国农村派”，劳农派近似于“中国经济派”。不过，日本与中国的论坛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影响。就中国来说，中国农村派的理论应当说是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现实。但就日本来说，讲座派究竟是否正确，是否正确地掌握了日本的现实，我认为还有重新探讨的必要。讲座派是以共产国际的一九三二年纲领为基础，被日本共产党看作是正统的理论。因而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站在这一立场上的人属于共产党系统，劳农派中的大多数人被视为社会党系统。由于战后的日中友好运动的领导权为日本共产党所掌握，因此出现了劳动派中关心中国的人也不太参加友好运动的现象。我们的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的会长有泽广巳先生，现在为日中学术交流作了很大的努力。但过去他却没有参加日中友好交流第一线活动的机会。其原因就因为他曾是劳农派。

曾在满铁调查部推进过“科学的”中国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很多人是讲座派。他们中很多人提出了这样的“理论”，说中国是停滞的亚洲式的社会，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近代化，只有依靠来自外部的冲击才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根据这种理论，日本侵略中国也等于是帮助中国进步了。战争期间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用这样的“理论”协助了战争。

(2) 各种研究机关的性质与分布状况

在古典的中国研究与现实的中国研究之间搭桥的努力，在战前的日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

比如在汉语学方面，本来是古典研究者的仓石武四郎先生，曾一面努力进行现代汉语的研究与教学，同时还提倡不用日本式的训读，而象中国人那样按中国原来的读法来读中国的古典。京都大学的吉川幸次郎先生也作过同样的努力。在文学方面，我们不能忘记曾主持过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竹内好先生的功绩。竹内先生从文学家的立场最先把鲁迅介绍到日本，战后对中国问题也十分活跃地进行过评论活动。日本人是通过竹内而认识鲁迅。竹内先生的思想和事业成就几乎没有传到中国，而那些在日本没有多大影响的人反而在中国变得十分有名。在社会科学方面，日本也作

过一些“搭桥”的努力。

到了战后，很多大学里逐渐开设了有关中国的讲座。而且配合学制改革，在那些战前从未开设过汉语课的所谓培养优秀分子的学校里，也逐渐作为第二外语开设了汉语课。

日本把史学、文学、哲学等称作人文科学，把经济学、法律学等称作社会科学，两者是有区别的。所以战前对中国古典社会的研究应属于人文科学。历来的中国文学课是用训读汉文的方法，仅教古典文学；东洋史对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从不讲授；中国哲学也只是讲古的。而现在这些领域里渐渐地吹进了新风，过去的遗风虽然还存在，但已经慢慢地出现了新的倾向。

关于现实中国的研究基本上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但由于前面所说的情况，在大学里开设中国政治论或中国经济论之类的课程，还不那么普遍。不过，一部分大学在战前就作为例外而开设了介绍中国情况的讲座。象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这样的私立大学就是如此。这种讲座是为了适应“进入”中国、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需要而开设的。另外，旧制的高等商业学校为了培养从事与中国贸易的人材，也曾讲授过中国经济论等课程。这些学校通过战后的学制改革全部升格为大学，所以结果在新制大学中有很多大学开设了

社会科学系统的有关中国的讲座。战前的外国语学校里当然有汉语科。这些外国语学校也通过战后的改革而成为大学，所以与此相适应的有关中国的课程及研究者也增多了。战前的这类高等专门学校在战后全都升格为大学，所以大学一下子增多起来。关于这个问题，准备在后面还要谈。

这样一来，在社会科学方面，各个大学也逐渐开设了有关中国的讲座，研究者也增多起来。其中有一些是过去的研究者，但大多数研究者可分为这样三类：出身于旧满铁调查部的人、出身于新闻记者或评论家的人，以及战后作为研究者培养出来的人。不过，从整体来看，与人文科学领域相比，属于大学、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从事中国研究的还不那么多。

下面想就研究所的情况谈一谈。研究所有附属于大学的研究所及与大学无关的独立的研究所两种。日本没有象科学院或社会科学院那样统率各个研究所的组织，所以与大学无关的大规模的研究所为数极少。

大学当然承担着学术研究和教育这两项任务。学术研究的任务，日本的大学要比中国的大学大得多。

在日本的大学里，集中最优秀的学者、构成研究中枢的是各个学部。大学附属研究所与各个学部相比，在大学管理方面的发言权小；起码就人文社会科学系统来说，一般没有设备齐全的大研究所。而中国方面